



論文集

「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

War and Peace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國防大學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十月出版

國軍的組成及其戰役檢討——以徐州會戰為例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蘇聖雄*

摘要

中日戰爭時期（1937-1945）的中國統帥部（軍事委員會），為國軍核心，掌控整個國家的軍事行動，極其重要；然而，學界對於中國統帥部本身的研究，相當貧乏。在中日戰爭史通論性的著作之中，雖多會提到中國統帥部的組織，但尚欠深入，至於統帥部內部究竟如何運作，相關研究，迄今仍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以此為題，探討中國統帥部的組成、運作及其檢討，為便於聚焦，特以徐州會戰時的統帥部為探討中心。

徐州會戰爆發於1938年4月至6月，為中日戰爭初期的大規模會戰，作戰區域為徐州周圍、津浦鐵路沿線。會戰前的台兒莊戰役，被中方視為「大捷」，傳頌至今。現下，徐州會戰及台兒莊戰役論者甚眾，研究成果豐碩。

論者對於徐州會戰及台兒莊戰役的進行，多從全知者的角度敘述，又或從參戰將領與部隊來探討，如從蔣中正的角度作分析，鮮少以中國統帥部為主體進行論述。現代戰爭，規模龐大，絕非統帥及前線官兵便能遂行戰爭任務，必定需要龐大幕僚團的協助，且需建立指揮體系，方能整合諸多參謀業務，完善戰役進行。職是之故，本文從中國統帥部的角度，重新審視徐州會戰。探討的重點有二：一、中國統帥部的組成為何？如何運作？孰為蔣中正所倚重的幕僚？二、從情報、判斷、通訊、越級指揮等層面，檢討徐州會戰時統帥部的指揮。至於會戰經過，由於相關研究甚為豐碩，本文便不再贅述。

一、前言

中日戰爭時期（1937-1945）的中華民國統帥部，為國軍核心，掌控整個國家軍事行動，極其重要；然而，學界對於統帥部本身的研究，相當貧乏。在中日戰爭史通論性的著作之中，雖多會提到統帥部的組織，但尚欠深入，至於統帥部內部究竟如何運作，相關研究，迄今仍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以此為題，探討統帥部的組成、運作及其檢討，為便於聚焦，特以徐州會戰時的統帥部——軍事委員會為探討中心。

徐州會戰爆發於1938年4月至6月，為中日戰爭初期的大規模會戰，作戰區域為徐州周圍、津浦鐵路沿線。會戰前的台兒莊戰役，被中方視為「大捷」，傳頌至今。現下，徐州會戰及台兒莊戰役論者甚眾，研究成果豐碩。

論者對於徐州會戰及台兒莊戰役的進行，多從全知者的角度敘述，又或從參戰將領與部隊來探討，如從蔣中正的角度作分析，鮮少以軍事委員會為主體進行論述。現代戰爭，規模

* 國史館助修；E-mail: shsu@dmh.gov.tw。

龐大，絕非統帥及前線官兵便能遂行戰爭任務，必定需要龐大幕僚團的協助，且需建立指揮體系，方能整合諸多參謀業務，完善戰役進行。職是之故，本文從軍事委員會的角度，重新審視徐州會戰。探討的重點有二：一、軍事委員會的組成為何？如何運作？孰為蔣中正所倚重的幕僚？二、從情報、判斷、通訊、越級指揮等層面，檢討徐州會戰時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至於會戰經過，由於相關研究甚為豐碩，本文便不再贅述。

二、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及演變

依據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政府之下，設置軍事委員會，為中央最高軍事機關，統率陸海空軍，執行最高統帥權，¹故軍事委員會，即為中華民國統帥部。1935年3月，國民政府通過「特級上將授任條例」，其第一條「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任為特級上將」，²4月1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特級上將，³又其亦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是，中華民國最高統帥，即為蔣中正。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求政略與戰略之配合，任命蔣中正為大元帥，並於8月20日發布成立大本營。大本營設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各一員，其下設總機要室及第一至第六等部，依序掌軍令、政略、財政、經濟、宣傳、訓練等事宜。大元帥未正式就職前，暫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施行指揮。⁴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經過仔細研究，認為大本營組織，過於重視形式，現時中日尚未宣戰，表面上仍對外聲稱避免戰爭，因此決定擱置大本營的設置，未就任大元帥，只就軍事委員會酌量改組，並將原擬設置之大本營6部納入該會。⁵10月，軍事委員會改組，設第一至第六部，依序掌軍令、政略、國防工業、國民經濟、國際宣傳、民眾組訓。另增設管理部、後方勤務部、衛生勤務部、警衛執行部等單位。⁶

淞滬會戰後，國民政府由南京西遷重慶，軍事中樞則遷武漢，整體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為適應新的局面，統帥部再度調整。1938年1月10日，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修正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及組織系統表，設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及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及辦公廳等單位。⁷何應欽出任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為白崇禧，並由徐永昌、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分任軍令、軍政、軍訓、政治部部長。⁸

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10月），頁57。

² 「特級上將授任條例」，〈陸海空軍官佐任官法令案（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40-0019。

³ 「蔣中正任為特級上將任官狀」，〈蔣中正聘任狀及賀函〉，《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6142-0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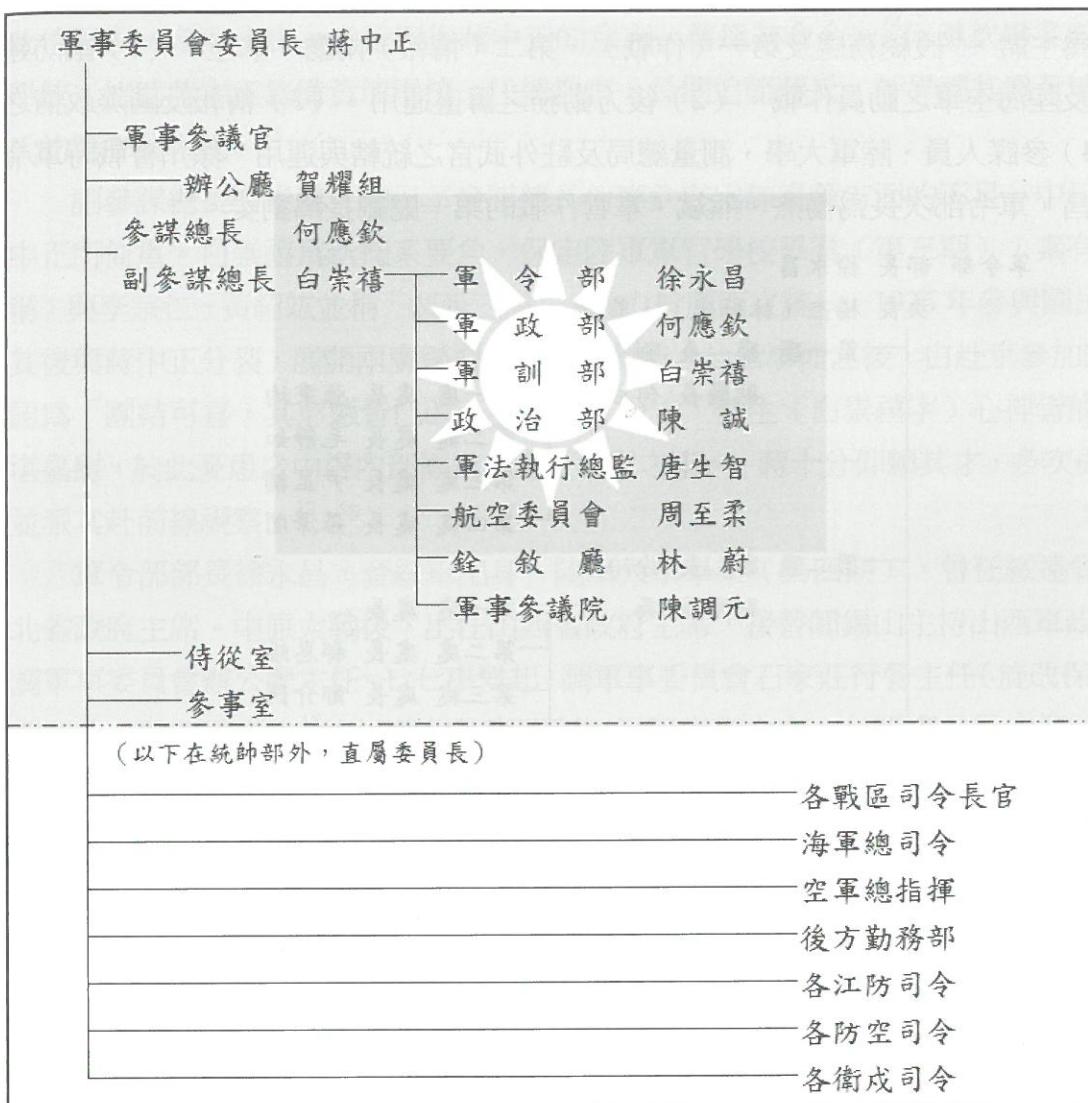
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8月），頁34-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10月），頁58。

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頁97。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9月），頁179。

⁶ 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一冊，軍事委員會（一）》（臺北：國史館，1996年1月），頁77。以下徵引作《軍事委員會（一）》。

⁷ 周美華編，《軍事委員會（一）》，頁78-82。

⁸ 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第一冊，軍事委員會（二）》（臺北：國史館，1996年12月），頁166-167。



圖一：軍事委員會組織系統圖（國民革命軍軍旗上者示統帥部內部機構。改繪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第三篇第三章第一節插表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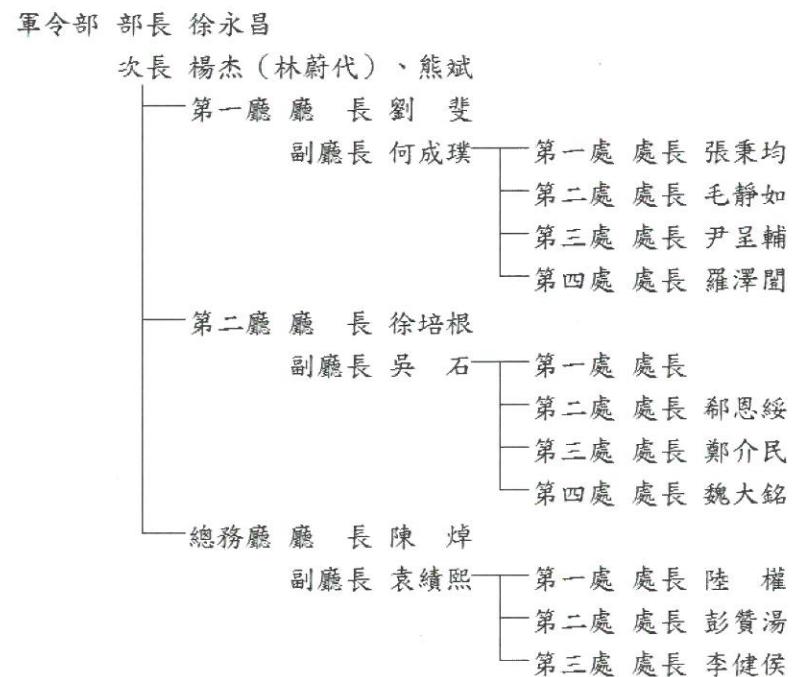
與軍事作戰最為相關者，為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部長。參謀總長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幕僚長，指導軍事委員會各部、會、廳，襄助委員長處理一切業務；副參謀總長輔助參謀總長處理一切業務。參謀總長辦公室在軍事委員會內，有2個參謀和2個秘書，皆為上校軍銜，由於何應欽兼任軍政部部長，因而參謀總長辦公室人員與軍政部部長辦公室的參謀、秘書合併辦公，統稱總長辦公室，以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中將主任秘書謝鍾元總其成，人員總數不多，僅20餘人。參謀總長辦公室的職能，主要是綜合和協調各部會的工作，具體業務，則仰賴各部會。⁹

軍事作戰的具體業務，由軍令部負責。該部由軍事委員會第一部與參謀本部合併組成，

⁹ 以下徵引作《軍事委員會（二）》。

⁹ 陳廷緝，〈在何應欽的參謀總長辦公室三年〉，《貴陽文史資料》，第3輯（1982年4月），頁153-154。周美華編，《軍事委員會（一）》，頁79。周美華編，《軍事委員會（二）》，頁167。

以原參謀本部為主體，¹⁰設總務處及第一（作戰）、第二（情報）兩廳，掌理：（1）國防建設、地方綏靖及陸海空軍之動員作戰。（2）後方勤務之籌畫運用。（3）情報及國際政情之蒐集整理。（4）參謀人員、陸軍大學、測量總局及駐外武官之統轄與運用。徐州會戰時軍令部部長為徐永昌，軍令部次長為楊杰、熊斌，掌管作戰的第一廳廳長為劉斐。¹¹



圖二：軍令部組織系統表，1938年4月15日（作者自繪）。

三、軍事作戰核心成員

軍事委員會各單位成員中，部分成員參與作戰指揮，對軍事行動影響很大，本文稱這群人為軍事作戰核心成員。軍事作戰核心成員，在中日戰爭八年期間，有所變動，以下介紹徐州會戰時的核心成員。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最高統帥，擁有最後決定權，是軍事委員會最重要的成員。軍事委員會的軍事作戰命令，多以其名義發出。蔣中正畢業於日本東京振武學校，¹²民國建國以來，參與諸多軍事行動，於其中地位不斷上升，終成軍事最高領導人。¹³

參謀總長何應欽，本應為蔣中正最重要的副手，協助指揮各重大戰役，然而，何應欽在

此位置上，參而少謀，多是跟從蔣中正的意志，傳達其命令。¹⁴何應欽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協助蔣中正籌備黃埔軍校，任總教官，長期追隨蔣氏，外界視其為黃埔系中僅次於蔣氏的第二號人物。¹⁵

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補足了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出謀畫策方面的不足，中日戰爭時深為蔣中正所倚重。白崇禧為新桂系要角，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第三期），素有「小諸葛」之稱，與李宗仁、黃紹竑並稱「廣西三杰」，致力於廣西之統一。1926年參與國民革命軍北伐，其後與蔣中正分裂，展開兩廣聯盟，與中央對峙。七七事變之後，白赴京參加國防會議，¹⁶蔣認為「團結可喜，其形態皆已改正矣」，又謂：「健生（白崇禧字）心神皆能開誠相應，殊堪嘉慰，於此憂患之中得內部團結，為最可慰之事。」蔣十分仰賴其才，多次與其談論軍事，並派其赴前線視察。¹⁷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晉綏軍出身，陸軍大學畢業（第四期），曾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後，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接替閻錫山主持山西軍政。1937年春，調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七七事變起，調軍事委員會石家莊行營主任（旋改保定行營主任），督劃第一戰區軍事。¹⁸旋以華北戰事不利，返回南京中央，任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部長。¹⁹蔣中正所以由徐出任軍令部部長，原因或為：（1）軍令部改組自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以徐出任，較無銜接問題。（2）徐為陸軍二級上將，在軍界輩分甚高，資歷足以勝任，又因其無親信隊伍，不適合於前線帶兵，留中央較為適宜。²⁰（3）徐在中央的工作成果，獲蔣所肯定。（4）蔣刻意納入全國各軍事派系進入統帥部，以營造團結抗日氛圍，像是桂系要人白崇禧出掌軍訓部，晉綏系要人徐永昌則出掌軍令部。²¹

軍令部次長熊斌，西北軍出身，陸軍大學（第四期）肄業，曾服務於北洋政府參謀本部，並主持馮玉祥部軍官之訓練，因而西北軍諸將領，泰半出其門下。熊於歷次戰事中，為馮玉祥出謀劃策，由是深得馮氏知遇。其後，任職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與塘沽協定談判。中

¹⁴ 李仲明，《何應欽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10月），頁238。

¹⁵ 劉維開，〈蔣中正在軍事方面的人際關係網絡〉，收入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頁69-70。

¹⁶ 程思遠，《白崇禧傳》（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年8月），頁i、7-8、199。白先勇編著，《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卷：父親與民國1983-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頁2-6。

¹⁷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1937年8月4日、8月29日、10月9日、10月13日、12月3日。

¹⁸ 張之淦，〈徐永昌傳〉，收入國史館編，《國史擬傳》，第4輯（臺北：國史館，1993年），頁112-118。「蔣中正致徐永昌手令」（1937年7月28日），〈革命文獻—華北戰役〉，《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08-002。

¹⁹ 《徐永昌日記》，1937年10月10日。

²⁰ 郭廷以校閱，李毓澍訪問，陳存恭紀錄，〈晉間的司庫：李鴻文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2期，頁182-183。

²¹ 徐永昌先生治喪委員會編，《徐永昌先生事略》，《徐永昌先生紀念集》（臺北：徐永昌先生治喪委員會，1962年），頁1-14。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病逝，15日，蔣中正往祭，於是日日記曰：「正午往祭徐次辰（永昌字）之靈，并見其遺容平安如常為慰，惜其臨終前未能一晤為憾。」《蔣中正日記》，1959年7月15日。

¹⁰ 陳長河，〈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政府軍令部〉，《民國檔案》，1987年第3期，頁134。1938年1月13日參謀次長熊斌擬定的軍令部編制草案，職員有二百人，而原參謀本部有二百九十餘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215。以下註釋該日記，僅記引用日期，不著編者、冊數、頁數。

¹¹ 周美華編，《軍事委員會（一）》，頁79。周美華編，《軍事委員會（二）》，頁167。

¹²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近代中國》，第147期（2002年2月），頁46。

¹³ 劉維開，〈導讀〉，《蔣中正與民國軍事》（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年12月），頁III-IV。

日全面戰爭爆發前，任參謀次長。由於參謀總長程潛甚為倚重其經驗，又另一位參謀次長楊杰不常到部辦公，熊因此實際主持參謀本部諸多工作。中日戰爭爆發後，熊任大本營總辦公廳主任，1938年初軍事委員會改組後，出任軍令部次長。²²

軍令部第一廳掌管作戰，廳長劉斐，早年就讀於南寧廣西陸軍講武堂、肇慶西江講武堂，在桂軍中任職，跟從白崇禧，屬新桂系一分子。隨白崇禧參與北伐，途中卸下戰袍，往渡日本求學，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步兵專門學校、日本陸軍大學。返國後，仍任職桂系。兩廣事變時，奔走中央、廣西兩地，調解衝突。七七事變後，經白崇禧、黃紹竑力保，任大本營第一部第一組（作戰組）組長。1938年初軍事委員會改組後，出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²³

德國軍事顧問在軍事委員會雖無特定名義，卻對軍事委員會的組織、戰爭指導有相當作用。戰前，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建立軍事工業，對日備戰，提供國防戰略建議，並曾擬就參謀本部編制及綱要、細則等，於軍令部組成時，為政府高層所參酌。²⁴七七事變爆發時的德國軍事總顧問為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又稱鷹屋，其出身貴族，自幼投考軍官學校，1900-1901年曾隨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元帥到中國鎮壓義和團，自此對東方文化漸感興趣。1907年畢業於德國參謀大學，即進入柏林大學東方學院研究。1909-1912年任職德國參謀本部，以通曉東方語文，被派至日本擔任德國駐日大使館武官，期間，對日本陸軍特性、作戰潛能等有所研究。1935年，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推薦已退役的法肯豪森接替其擔任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中日戰爭爆發後，法肯豪森直接擔任戰役參謀並負起指揮工作。²⁵

軍事委員會中蔣中正的重要軍事幕僚，除了白崇禧、徐永昌及軍令部內的劉斐等人，尚有林蔚。林蔚與蔣中正是浙江同鄉，畢業於陸軍大學，早年投入浙軍，參謀業務嫻熟，個性謹慎穩重。北伐時投入國民革命軍，其後擔任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廳長等職。七七事變後，徐永昌出任石家莊行營主任，林蔚任參謀長。1938年1月，軍事委員會改組成立軍令部後，次長楊杰赴蘇聯洽商援助未能到職，該職遂由林蔚代理。4月，林蔚又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主管戰區的作戰規畫，而一般文書和一般參謀業務，則交侍從室第二組（主管軍事參謀業務）組長於達處理。²⁶

²²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2期（1991年2月），頁98-100。

²³ 劉沈剛、王序平，《劉斐將軍傳略》（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年9月），頁1-20。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2期，頁45-100。

²⁴ 劉復著，梅寅生譯，《中國現代軍事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4月），頁66-74。《徐永昌日記》，1938年1月10日。

²⁵ 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1934-1938）〉，《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46。傅寶真，〈抗戰前及初期之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十一）〉，《近代中國》，第78期（1990年8月），頁130-133。馬振犧，〈德國軍事總顧問與中國抗日戰爭〉，《檔案與史學》，1995年第3期，頁43-54。

²⁶ 秋宗鼎，〈蔣介石的侍從室紀實〉，《文史資料選輯》，第81輯（1982年7月），頁109-111、114-115、118-122。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7月），頁114-116。戚厚杰，〈林蔚（1889-1955）〉，收入《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5集（北京：解放

軍事作戰核心成員兼顧了國內各地重要軍系，蔣中正、何應欽是中央軍出身，白崇禧、劉斐是新桂系出身，徐永昌係晉綏軍出身，而熊斌屬西北軍，林蔚屬浙軍。就軍事教育派系來說，核心成員含括當時最重要的保定系、士官系、黃埔系，如白崇禧畢業於保定軍校；何應欽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並可視為黃埔系第二號人物；蔣中正為黃埔軍校創辦人，並可視為廣義的保定系、士官系。²⁷就歲數（至1938年）來說，軍事作戰核心成員大多步入中年，歷經內戰、剿共諸役，軍事經驗豐富。

軍事作戰核心成員組成表

職稱	姓名	出生年	歲數	系統	教育程度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中正	1887	51	中央軍系	日本振武學校
德國軍事總顧問	法肯豪森	1878	60	外籍顧問	德國參謀大學
參謀總長	何應欽	1890	48	中央軍系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副參謀總長	白崇禧	1893	45	新桂系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軍令部部長	徐永昌	1887	51	晉綏系	陸軍大學
軍令部次長	熊斌	1894	44	西北軍系	陸軍大學肄業
軍令部次長	林蔚	1890	48	浙軍	陸軍大學
軍令部第一廳廳長	劉斐	1898	40	桂系	日本陸軍大學

圖三：軍事作戰核心成員組成表

四、軍事委員會戰時運行模式

在戰事進行之時，隨著戰況需要，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中正不定時召集官邸會報，於會議中決定軍事部署。此一官邸會報，在戰前便會舉行，如1934年1月9日，蔣召集參謀總長程潛、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廳長林蔚等討論軍隊駐地、改編、工事構築、參謀旅行等事宜。²⁸戰爭初期，會報時間不定，1938年9月10日之後，會報定期於每星期一、三、五舉行。²⁹

中日戰爭時參與會報的人員，並不固定，大抵為上述軍事作戰核心成員，及軍事委員會高層人員，如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軍事參議院院長、軍令部部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軍法執行總監、後方勤務部部長、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軍令部次長、軍令部第一廳廳長、自外地向蔣覆命之戰區司令長官或總司令、蔣官邸所在部隊之首長、總司令。

軍出版社，1999年1月第2版），頁413-425。張瑞德，〈無聲的要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近代中國》，第156期（2004年3月），頁156-157。

²⁷ 劉維開，〈蔣中正在軍事方面的人際關係網絡〉，頁60-71。

²⁸ 「委座官邸會報議程」（1934年1月9日），〈軍事會議〉，《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005-0001。

²⁹ 《徐永昌日記》，1938年9月10日。

外國軍事總顧問，亦在出席名單之列。會議紀錄，通常由軍令部第一廳成員製作。自 1938 年 9 月 28 日以後，官邸會報設秘書處，由軍令部次長負責主持。³⁰

由於目前尚未覓得徐州會戰時的官邸會報紀錄，現暫以 1938 年 9 月 28 日下午 6 時至 8 時舉行的官邸會報為例。該次會議之主席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出席者有參謀總長何應欽、蘇聯軍事總顧問切列潘諾夫（Alexander Ivanovich Cherepanov）、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後方勤務部部長俞飛鵬、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軍令部次長林蔚及熊斌、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武漢衛戍總司令羅卓英、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組組長於達，而紀錄則是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處長羅澤闔。³¹

會報過程，蔣中正對軍事行動的裁決，即交軍令部辦理。軍令部是當時最高軍事指揮機關，³²蔣中正的裁決交軍令部之後，由軍令部參謀擬定命令，以最高統帥蔣中正的名義發電至前線，如此下的命令，係依常規軍事系統。以 1938 年 10 月 10 日的官邸會報為例，劉斐在會上提出，軍令部擬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一部向日軍山下兵團後方突擊，以截斷瑞武公路之隘路，遮斷其後方聯絡線。蔣中正裁決「對敵山下兵團反攻計劃可實行」。³³次日，軍令部以蔣中正名義電令在前線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為使湯集團之攻擊奏功容易，應飭薛兵團以有力部隊由山下兵團後路夾擊而殲滅之，並須迅速掃蕩萬家嶺、張姑山一帶殘敵，免致死灰復燃。若能集中該兵團一部迫擊炮即手榴彈班與敢死隊等解決該敵，當能迅速為要。³⁴

軍令部對蔣中正較為簡短的裁示，作了詳細計畫，敷陳出更為詳細的電令，對於執行部隊、進軍方向、戰術作為，皆有所指示。又如，1940 年 5 月 10 日的官邸會報，時棗宜會戰正在進行，蔣中正裁決授與第五戰區命令要旨：

- 1、命李及蘭軍已渡河之兩師，全力進襲花園孝感。
- 2、命張自忠集團以主力先向唐縣鎮、棗陽間進襲，遮斷公路，再轉向敵背後攻擊。
- 3、命王纘緒集團全力轉向隨縣、唐縣鎮間進襲，遮斷公路。
- 4、命孫連仲、湯恩伯兩集團南向隨棗方面追擊敵人。
- 5、命劉汝明、王贊斌兩軍攻略信陽，准懸賞五十萬元。

³⁰ 「委座官邸會報紀錄」（1938 年 9 月 28 日），〈全面抗戰（二十）〉，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3-00053-001。

³¹ 「委座官邸會報紀錄」（1938 年 9 月 28 日），〈全面抗戰（二十）〉，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3-00053-001。

³²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編，《高等司令部之參謀業務：總顧問法肯豪森將軍講演錄》（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1938 年），頁 57。

³³ 「委座官邸會報紀錄」（1938 年 10 月 10 日），〈全面抗戰（二十）〉，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3-00053-001。

³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821。

6、空軍應轟炸隨棗間敵車輛部隊。

7、命第五戰區乘敵態勢不利，退卻困難，應捕捉殲滅之於戰場附近，如不能達成任務，自總司令以下應受處罰。³⁵

蔣的裁決，除去第六項與空軍有關部署，軍令部於同日作成訓令，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副司令長官孫連仲、江防軍司令郭櫛曰：

- 1、鄂北之敵經我多日圍攻，糧彈殆盡，必將向原陣地退卻。
- 2、第五戰區應乘敵態勢不利，退卻困難之好機，以全力圍攻捕捉殲滅之於戰場附近，爾後即向應城、花園之線追擊。
- 3、李及蘭軍應全力進襲花園、孝感，遮斷平漢路。
- 4、王纘緒集團應全力轉向隨縣、唐縣鎮間進襲，遮斷公路。
- 5、張自忠集團應以主力先向唐縣鎮、棗陽間進攻，遮斷公路，再轉攻敵背後。
- 6、周碩（鼎）軍速東向棗陽方面進攻。
- 7、孫連仲、湯恩伯兩集團，速南向隨、棗，截擊敵人。
- 8、劉汝明、王贊斌兩部，應襲擊信陽，如奏功，准懸賞五十萬元。
- 9、張、周、孫、湯各部，應確取聯絡，協同動作。
- 10、敵主要退路只有唯一的襄花路，而該路雨後車輛不能運動，希嚴督各部，努力進擊，必能收穫空前戰機。以往湘北、粵北諸役，缺乏有計畫的追擊，致成果不良。此次我各部戰力健在，應乘勝窮追，擴果（張）戰果。其作戰不力，不能達城任務者，自總司令以下，應予處罰。³⁶

令文第一、第二項，為軍令部對當前日軍態勢及國軍戰略之描述，其第二項為官邸會報第七項部分內容。第三項對應官邸會報的第一項裁示，第四項對應官邸會報第三項，第五項對應官邸會報第二項，第七項對應第四項，第八項對應第五項。而第六、九項並非蔣中正官邸會報裁示，當為軍令部的補充。第十項則為總結，並及官邸會報第七項部分內容。由此二例，可見蔣中正的裁示成為實際命令之過程，也可見軍令部對於蔣的指示作了相當衍繹，電往前线的命令乃更為周詳。

除了透過會報，蔣對前線若隨時有指示，會透過侍從室轉告軍令部，軍令部再分令前線。如 1938 年 5 月 9 日，蔣手令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請前線注意對日戰術，林蔚接到後，便交軍令部分令。³⁷此亦常規系統下的軍事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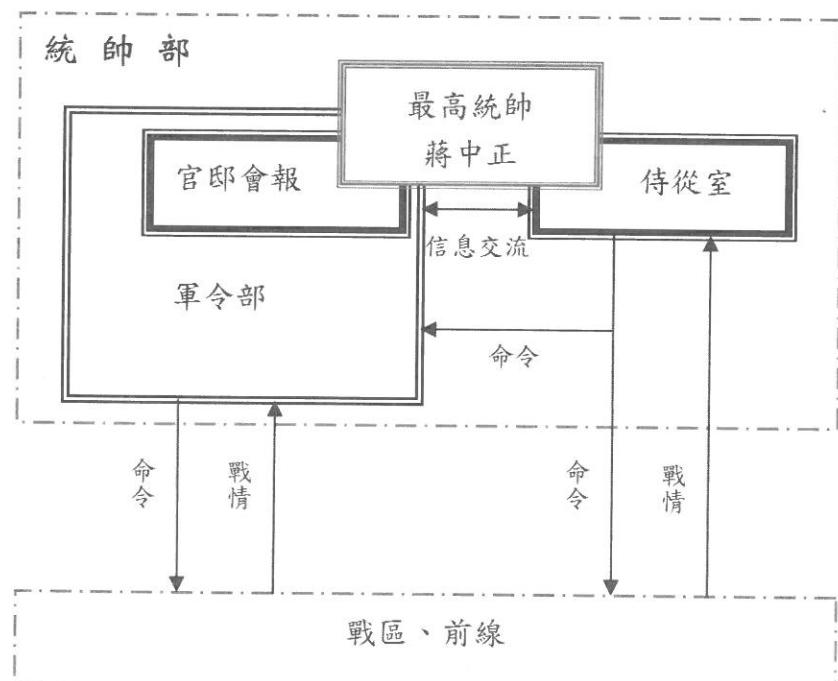
³⁵ 「委座官邸會報紀錄」（1940 年 5 月 10 日），〈全面抗戰（二十）〉，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3-00053-001。

³⁶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冊，頁 998-999。

³⁷ 「蔣中正致林蔚條諭」（1938 年 5 月 9 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33。

蔣中正需要發揮個人影響力或戰況危急時，會不透過軍令部，逕自打電話或電令前線，這個狀況，需透過侍從室的協助。若為打電話，可能由蔣中正親電，也可能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電話轉述蔣意。³⁸若為拍電報，有兩種狀況，一為蔣親擬或口述手令，再由侍從室電至前線。這樣的電報，與軍令部發出者（署「中正」）不同，其下署有「中正手啟」或「中正手令」字樣。³⁹另一種狀況是侍從室主辦，再經蔣批閱發出者，其下署名「中正侍參」。由於各部隊重視蔣的權威，對於非自侍從室發出之電文不見得遵行，故軍令部等單位為求命令有效，有時也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⁴⁰

前線軍事將領對於戰況的意見或情報，有時逕行電告最高統帥蔣中正，有時則電致軍令部。呈送給蔣中正的軍事電文，先由侍從室整理、過濾，再摘述呈交蔣中正，此種戰情電文，侍從室同時抄交軍令部判斷、參考，⁴¹軍令部所獲情報，亦會呈送侍從室，侍從室摘述後，呈蔣中正參閱。如1938年2月10日，軍令部便將其派駐北平之特派員所獲情報，呈送蔣中正知悉。⁴²



圖四：戰時軍事委員會運作圖（作者自繪）。

³⁸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頁215。

³⁹ 例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684-685。「蔣中正致湯恩伯電」（1938年5月12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35。由於《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或所收蔣中正（或軍令部以蔣名義）發出的電文為電「稿」，故其下署名以「中○」、「中○手啟」、「中○手令」呈現。

⁴⁰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216。

⁴¹ 「李宗仁呈蔣中正電」（1938年2月15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12。此戰情電文之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批示：「以後應移此項電報分發軍令部。」

⁴² 「軍令部呈蔣中正報告」（1938年2月10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10。

各戰役期間，蔣中正不時至前線召集指揮官開會，指示作戰機宜。如徐州戰事吃緊時，5月12日，蔣獲永城、鄆城失守之報，決定親赴前方部署，下午，飛鄭州指揮戰局。⁴³在飛機上，蔣與同行者林蔚、劉斐等討論戰局，蔣認為徐州正處危險關頭，研究先前發出的命令可否貫徹。抵鄭州之後，蔣派林蔚、劉斐組織參謀團赴徐州，要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解決日軍的大包圍，並向各級將領要求貫徹軍事委員會的命令。⁴⁴

五、軍事委員會指揮之檢討

徐州會戰過程，國軍有不少表現可圈可點之處，惟亦呈現諸多問題。本節從情報、判斷、通訊、越級指揮等四個層面，檢討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一）情報

軍事委員會獲得情報的方式相當多元，有自前線傳來的情報，也有來自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等情報機關的情資，尚有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會、⁴⁵駐美陸軍武官⁴⁶等訊息。這些情報，很多是直接呈送給最高統帥蔣中正。大量的訊息，蔣不會直接閱覽，而是先經過侍從室整理、判讀，過濾後摘由送蔣批閱，若是軍事情報，同時抄交軍令部參考。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獲得的情報，也會分享給軍令部，⁴⁷如5月10日徐永昌謂：「昨早閱戴雨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情報中有一條某地六日電濟寧，敵人若干已進至魯台東北某地云云，頗堪注意。當詢之第一廳何副廳長，云戰區無此項報告，戴之諜報決〔絕〕對不實。」⁴⁸

德國軍事總顧問，有其情報管道，其所獲情資，亦會與軍事委員會分享。如5月19日，法肯豪森電話告訴徐永昌，謂香港廣播，發布中國徐州、宿縣均已陷落消息，此時軍事委員會尚不知此訊息，徐永昌以為是日人造謠。又如，5月23日，法肯豪森獲開封已被日軍衝入消息，即電告徐永昌知悉。⁴⁹

戰時軍事委員會非常仰賴來自前線部隊的情報，但此項情報相當不確實。徐州會戰後，徐永昌檢討國軍缺點，第一項便是「報告不確」，「上下欺矇捏造事實，影響上級官判斷」。⁵⁰這種欺瞞狀況，第一線部隊內部便發生，第二〇〇師副師長邱清泉戰後檢討謂：「下級謊

⁴³ 《蔣中正日記》，1938年5月12日。

⁴⁴ 劉斐，〈徐州會戰概述〉，收入《正面戰場：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1月），頁31-32。

⁴⁵ 如5月23日，軍令部第二廳得教會方面消息，日軍一部已到周家口附近。《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23日。

⁴⁶ 「軍令部呈蔣中正報告」（1938年4月18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22。

⁴⁷ 蘇聖雄，〈1939年的軍統局與抗日戰爭〉，《抗戰史料研究》，2014年第1輯，頁114。

⁴⁸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0日。

⁴⁹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9、23日。

⁵⁰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7日。

報成習慣，終不得真實之情況。」⁵¹師以下已是如此，層層謊報上去，軍事委員會所獲得的情報，必定與事實相距甚遠。

第二軍軍長李延年，曾舉實例說明報告不確對指揮部署的影響。其認為徐州失敗一因，「敗於判斷敵情之錯誤」：第二軍過徐時，知長官判斷日軍欲取海州，故令第二軍主力往徐州以東。而長官所以如此判斷，乃某軍在郊城馬頭以南，遇日軍千餘，即停止進攻與敵相持，並報稱此係日軍主力。長官據此，證明自己判斷不錯，故令國軍主力東移，實則該處皆為小部。如此，便產生錯誤部署，貽誤大局。⁵²

由於前線希求邀功倖賞或求援，又或欲推卸責任，故妄報軍情極其嚴重，此係國軍在中日戰爭一年來的普遍現象，實際上也是古今通病。除對日軍兵力誇大報告，日軍傷亡亦粉飾浮誇，各級若小有斬獲，斃敵百餘，必曰斃敵數百；虜獲槍枝十餘，或曰俘獲無算。至於作戰不力，要地不守，不曰敵情如何嚴重，即曰如何不得已。⁵³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便批評第二十軍團軍團長湯恩伯還沒有打仗，便先報功。⁵⁴第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也批評第二十七軍軍長桂永清、第二〇〇師副師長邱清泉將日軍搜索隊主動後退，吹噓為「蘭封大捷」。⁵⁵類似這樣的謊報，第十三師參謀蘇民謂：

總之務使自己頭頭是道，主官以粉飾好看為判行唯一條件，承辦人員以捏造不漏破綻而盡，思之能事，養成一種欺矇無恥惡習，其團長以下遇師旅督戰嚴厲，遇攻地則報告已攻佔某處，遇攻城則報告已攻進兵力若干，結果全係子虛，事後另捏理由，似此上下欺矇，最足影響高級長官之判斷。⁵⁶

不過，除了這種有意欺瞞的狀況，不少情報所以不確實，是因為情報訓練、組織不完善。前線軍隊利用在地人獲取情報，但他們可能缺乏國家觀念，又無軍事知識，甚至以訛傳訛反為敵欺。⁵⁷

戰後，徐永昌對情報訓練班講話，強調情報為軍中耳目，徐州之失，是因在徐州以西應置重兵而未置；合肥之失，是因兵力分散；蒙城之失，是因兵不能使用；鄆城之失，是因不知敵來。總結來說，徐州失敗，「因兵力強弱者少，因不知敵情者多」。⁵⁸

情報傳遞過遲，是另一問題。像是第六十八軍劉汝明部，於徐西與日軍在瓦子口及永城南北之線激戰時，獲得日軍有一縱隊千餘人、附戰車數輛之報告。劉汝明得此報告，為避免日軍威脅指揮機關所在，決心乘夜襲擊該敵，惟國軍到時，日軍已去數小時，追襲不及，徒勞往返，甚且影響他方面之作戰。劉因此謂：「倘能早得報告，迅速動作，定能收意外之效

⁵¹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年1月再版），頁7。

⁵²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2。

⁵³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3-34。

⁵⁴ 吳廷環編，《孫彷魯先生述集》（臺北：孫彷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1981年2月），頁103。

⁵⁵ 宋希濂，〈蘭封戰役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2年6月），頁166。

⁵⁶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34。

⁵⁷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27。

⁵⁸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24日。

果，此情報搜集影響於戰鬥成果者。」⁵⁹

又如，5月9日，日軍包圍國軍重要據點蒙城，以猛烈砲火攻擊，天未明，日軍已突入南門、西門。上午7時，完全占領蒙城。⁶⁰然而，徐永昌當晚7時與在前線的白崇禧通電話，得知第五戰區兩師昨已到蒙城西南40餘里，第三十一軍抽派一師向蒙城馳援，而蒙城仍在國軍手中，白並告以「敵約一旅，決不能逞」。次日午後，徐永昌方悉蒙城於昨日陷落。⁶¹此例呈現前線回報之樂觀，與實際戰況不符，亦呈現軍事委員會獲悉前線狀況時間上的落差。這些都必定影響軍事委員會的判斷。

國軍情報問題甚多，但也非乏善可陳。國軍仍有能力透過各種管道，獲得日軍準確的情報。如透過諜報、截取電報、於戰場上虜獲軍事文件等。諜報方面，李宗仁有管道透過香港的人員，獲取日本軍事機密。如5月4日，李呈蔣中正，云獲香港方面諜報，日本大本營決定5月5日總攻徐州。⁶²此一情報非常精確，5月5日當日，日本華中派遣軍即發動總攻。截獲日軍電報方面，5月中旬，國軍便截獲日軍第十四師團以儀封、歸德為目標的命令。⁶³虜獲軍事文件方面，5月14日，國軍於蒙城東南俘獲日軍參謀，獲日本軍事文件，得悉日軍第九、第十三兩師團經蒙城，一由永城向碭山，一由亳州向歸德，其十六師及山下兵團，一由金鄉向歸德，一由魚台向碭山。不久，又於韓道口擊斃日軍參謀，從俘獲文件悉日軍永城方面之兵力及目標。⁶⁴

（二）判斷

台兒莊戰役後，中日兩軍在魯南交戰，時或稱台兒莊戰役為「第一次魯南會戰」，其後為「第二次魯南會戰」。⁶⁵軍事委員會欲再度於魯南創造勝利契機，即便獲報日軍不斷增援，仍投入大批軍力。同時，軍事委員會不知日軍投入魯南的兵力是為吸引國軍，實則日軍將在魯西發動總攻。⁶⁶龐大國軍於是在魯南與日軍僵持，陷入被動狀態，且忽視魯西的布防。如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檢討：「大軍作戰勝敗之分野，端視主動與被動，兵力眾寡其次焉者也，蓋一陷被動，則必致處處防備，處處薄弱。……此次徐州會戰，我軍雖四倍於敵，

⁵⁹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28。

⁶⁰ 〈徐州作戰の段階〉，昭和13年3月～昭和5月中旬，《高嶋少將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878200。

⁶¹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9、10日。

⁶² 「李宗仁呈蔣中正電」（1938年5月4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31。該電傳從室5月5日上呈蔣中正，並抄知軍令部。

⁶³ 「蔣中正致李宗仁電」（1938年5月17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45。

⁶⁴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15日。

⁶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運河垣曲間黃河兩岸之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10月再版），頁44。

⁶⁶ 〔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支那事變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2月），頁45。《支那方面作戰記錄》，第1卷，昭和21年12月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752700。

但主動地位已失，終於失敗。」⁶⁷徐永昌的檢討，亦謂：

- 一、大本營料敵錯誤，戰區指揮失當。
- 二、劉汝明軍不應調離濟寧一帶。其孫（桐萱）、曹（福林）部派離防線外者幾達一半，亦係得不償失。
- 三、魯西當增兵而未增。
- 四、第七、第四十八軍約四師以上兵力不能拒數千敵於蒙城，東南指揮者偏重游擊，部隊亦少戰鬥力（亦徐州失敗重要因素）。
- 五、對敵增四、五師於津浦，我所增之兵悉被戰區強調於徐州以東，則尤為失敗之大關鍵（如敵在魯南調右翼兵用於左翼，新增兵用之魯西戰區，竟忽視之）。⁶⁸

除第四點以外，皆是強調忽視魯西防禦之誤。濟寧一帶便是魯西，劉汝明部及許多新增兵力，原為防備魯西及隴海一線，多被調至徐州以東魯南一帶，使得魯西兵力不足。不過，事實上，軍事委員會對魯西防禦，也不是沒有注意。戰前蔣中正便指示不宜將整個部隊全放在火線，要留有強大預備隊，待好機再實行側擊。台兒莊戰時，蔣為防日軍進攻魯西，一度暫緩對日軍的圍擊。台兒莊戰後，劉斐在4月21日前後，曾建議蔣中正抽調機動兵團，加強魯西兵力，5月初，徐永昌也有類似的建議。但蔣中正仍重視維持當前陣地，加以軍事委員會內受到情報的導引，以為中日兩軍兵力對比大，國軍四倍於敵，故不僅蔣中正，徐永昌亦認為魯南戰況仍有可為，因此，軍事委員會即便對魯西早有注意，卻未能充分正視。徐州失守後，蔣乃電李宗仁、程潛，告以國軍之病，在輕於使用預備隊，此後當予改進。⁶⁹至於像《李宗仁回憶錄》所說，在5月初就要避免日軍包圍，自徐州全面撤退的戰略，⁷⁰軍事委員會並未討論，且即便李宗仁本人，當時亦無意如此。⁷¹軍事委員會是時採取持久消耗戰略，不致未與日軍相當抵抗後，便放棄廣大防守區域，坐令日軍長驅直入，拿下徐州。

軍事委員會對日軍戰力的估計，有所偏差，雖對日軍兵力的計算，出入並不小，惟中日兩軍裝備、素質差異甚巨，計算人數多寡難以呈現實質戰力，若計算火力強弱，則較為實際。徐州會戰魯南戰場，國軍高達50餘師，對上日軍4個師團，仍無法取勝，因日軍雖係4個師團，若以火力計算，加上精神教育等，遠超過國軍50餘師。且國軍單位、人數多而火力薄弱，運輸時間長，傷亡率又大，且指揮聯絡困難，團結火力亦較差。⁷²

國軍各部編制龐雜，亦多少影響軍事委員會對中日戰力的評估。國軍編制，多半因人而

⁶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4月），頁638。

⁶⁸ 《徐永昌日記》，1938年5月26日。

⁶⁹ 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頁73-74。

⁷⁰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12月），頁723-731。

⁷¹ 其實，第五戰區全軍撤退後，李宗仁上電自請議處，便說到他的問題是「未能窺破敵之詭計，致被牽制於魯南，魯西、淮北之敵，兩方包圍之勢已成，雖抽調魯南之兵，卒以敵機妨礙，運輸遲鈍，應付不及」。參閱「李宗仁李品仙呈蔣中正電」（1938年6月3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國史館藏，002-020300-00010-066。

⁷²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71。

設，以致軍制龐雜，隊號誇大，不問實力之多寡，徒擁虛名。有一軍指揮一師者，有一軍團指揮一軍者，更有一集團軍指揮兩師者。一軍直屬的一師，作戰犧牲後，每師只有2、3團或1、2團，甚或僅有2、3營。如第一三九師黃光華部守備蕭縣，僅2營餘，在指揮官心裡，以為有1個師的兵力，守蕭縣應可支持，其實該部兵力極度匱乏，終致蕭縣失守。⁷³因此，軍事委員會以中日兩軍兵力比做判斷，難以做出正確部署。

總結來說，軍事委員會未悉日軍計謀，龐大兵力被日軍吸引於魯南，又未悉兩軍實際戰力比，以致忽視魯南及津浦線南面之部隊戰力，最終導致後路被切斷，全軍只得臨時全面撤退。

（三）通訊

現代戰爭所憑藉著，一為火力，二為裝備，三為通訊。⁷⁴通訊對統帥部的指揮，尤為重要，蓋若通訊不佳，統帥部無法將命令傳送前線，前線亦無法將所見及戰情回報，如此，統帥部根本無從指揮。

徐州之通訊，尚稱便利，其有線電報，可直達鄭州、南京、濟南，其長途電話附設於電報局內，可通運河岸、窑灣、宿縣、豐縣、陽山、睢寧、台兒莊、韓莊及兗州各地。武漢（軍事委員會所在）與徐州，亦可直接通電話。⁷⁵

雖軍事委員會往戰區的通訊布建尚可，但戰區各部隊的通訊卻大有問題，這勢必影響軍事委員會意志的貫徹，也導致情報的回復遲滯。通訊所以出問題，大抵因通訊技術不良及通訊器材不足。前者因通訊人員缺乏訓練，通信常識及架設技術太差，故緊急時，指揮官每因通信不靈而無法指揮。後者以有線電來說，配賦器材甚少，因此在距離遠隔之山地，除賴無線電外，難以通訊。以無線電來說，受天候影響與報件擁擠影響，部隊需相當時間才能傳遞、接收訊息，急要電報，即不能適時拍收，致失時效。⁷⁶

通訊不良造成戰況不佳，像是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一四五師第四三三旅在湯家溝附近擔任江防，6月11日，上級電調該旅至安慶東北之十八步附近，至12日，因有線電不通，師部才以無線電轉令，致使該旅未能到達目的，而安慶附近，因此極端空虛，為敵所乘。12日以後，上級又迭令該旅突過桐懷公路向潛山附近轉進，並告以桐懷公路極易通過，該旅亦以收到較遲，自行渡過南岸，使潛山附近戰役，兵力薄弱，不能長久支持。第四三三旅這樣的情況，十分普遍，上級傳至軍級的命令或通報等，有遲至十餘日始收到者。⁷⁷下級傳給上級的報告，亦有所延滯。徐州戰況危急時，蔣中正電第一戰區參謀長晏勛甫，嚴令此間無線電臺

⁷³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72。

⁷⁴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陳三井、馬天綱、陳存恭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6月三版），頁158。

⁷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四）》，頁275-276。

⁷⁶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40-141。

⁷⁷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43-144。

專與徐州通報，如有兩架更好。蔣所以如此下令，乃因「徐州昨日各要電，今日始接到」。⁷⁸又蘭封戰鬥時，蔣於5月20日午夜手令宋希濂、桂永清在蘭封設通信所，並諭以「不注重通信連絡，焉能指揮大軍？」令文係用紅藍鉛筆反覆塗改，⁷⁹顯示蔣極為重視此事，也呈現國軍嚴峻的通信問題。

中間指揮機關過多，使通訊負擔加重，也使命令傳達時間加長。因此，上級命令至於部隊，往往失去時效，如此，非特任務難期達到，對於命令之威信，亦無形減少。⁸⁰

各部隊間的聯繫，多藉由電話，由於器材不敷使用，致架設均係單線，加以技術不良，作戰開始一遇日機轟炸，全線即皆不通，因之彼我情形不明，而指揮官亦無從指揮，各部各自戰鬥，自生自滅，乃至因友軍不能聯絡、不能互相援助，國軍常遭日軍包圍。⁸¹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在從徐州撤退至宿縣過程，因宿縣失陷，致馬匹、通信人員等被日軍衝散，故無法與軍事委員會聯繫。其後與軍事委員會聯繫上後，仍無法與湯恩伯、孫連仲各部相聯繫，李乃請蔣中正直接指揮湯、孫各部。⁸²

通訊不機密也是國軍通訊一大問題。日軍攻擊台兒莊前，便獲得國軍在徐州、台兒莊集結優勢兵力企圖攻擊之情報。⁸³國軍徐州失陷前後，戰況危急，蔣中正以通訊不保密對各將領十分不滿，記到：「各將領智識淺鮮，譯電不有常識，必為敵方所譯，可歎也！」⁸⁴也因此，蔣改換電訊密碼本，⁸⁵或以飛機投送指揮前方的文電，以求保密。⁸⁶對於通訊機密問題，第七十四軍戰後檢討，認為作戰之指導，以利用筆記為第一，倘距離過遠，時間所不許時，則可用有線電報，至於有線電話對最機密事項，無論距離遠近，絕不可任意使用，蓋敵方間諜既多，而以金錢收買之漢奸亦屬不少，往往攜帶話機掛線竊聽，倘以電話為傳達命令之工具，則國軍計畫與處置尚未實施，敵已瞭然。⁸⁷

（四）越級指揮

越級指揮是許多將領詬病蔣中正的指揮之處。⁸⁸第五戰區為徐州會戰進行之地，身為最高統帥的蔣中正，對司令長官李宗仁有許多指示，不過，越級指揮的狀況雖有，卻似並不嚴

重，這或許是因為李宗仁係新桂系領袖，且該戰區有許多新桂系基本部隊，中央欲指揮亦指揮不動。

會戰時，蔣曾直接干預戰區內部的部署，亦有組織統帥部臨時參謀團協助李宗仁。參謀團成員，包括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其身兼中央代表，又為桂系要角，雙重身分，或足使中央、地方的聯繫更為緊密。在統帥部與戰區各有組織運作的情況下，國軍總攻台兒莊日軍前，蔣中正並未每日關注戰況。他於3月24日赴徐州部署後，次日即往遊洛陽龍門等處，28日始返武昌。4月3日，又登黃鶴樓眺望。⁸⁹7日，台兒莊獲得勝利。

徐州失陷後，隴海線上的戰事屬第一戰區管轄範圍，司令長官程潛。程在國民黨資歷甚深，北伐時任第六軍軍長，抗戰爆發前擔任參謀總長，於軍界輩分甚高，但欠缺基本部隊。此時軍事委員會調派至隴海線的部隊，有大量中央軍，如第十七軍團胡宗南部、第七十四軍俞濟時部、第七十一軍宋希濂部、第二十七軍桂永清部、第八軍黃杰部，諸將皆為蔣中正的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如此，創造蔣越級指揮的契機。

5月20日，蔣中正對蘭封戰況布置未妥甚為不滿，認為「戰區幕僚皆不行，而且大意糊塗，以為事事不緊要，即使國亡亦以為不緊要也」。⁹⁰於是，蔣親自手擬作戰計畫，⁹¹詳細電示軍隊部署，連他自己也感覺「終日處理軍務似近瑣細」，「但如此仍不能使前方處置完妥也」。⁹²21日，電第一戰區指示第一九五師、第一師之駐地與任務，⁹³並以電令或電話指揮桂永清、宋希濂二軍長。⁹⁴22日，急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猛力夾擊儀封附近日軍。⁹⁵23日，再電商震多組別動隊向遠方偵查。⁹⁶同時以最急電令宋希濂速率部向羅王進擊，並轉李漢魂、俞濟時各軍長夾擊日軍。⁹⁷

當時第二十集團軍、第二十七軍、第七十一軍等部，皆在第一戰區戰鬥序列之下，故蔣中正直接指揮商震等將領，是越過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越級指揮。戰事發生前，宋希濂方受命時，曾問蔣中正：「我的部隊歸誰指揮？」蔣想了一下說：「暫歸我直接指揮。你到蘭封後，隨時來電話報告，我將在鄭州暫住一個時期。」當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也設在鄭州，宋希濂日後認為：「論理我軍應該歸程潛指揮，但蔣介石（蔣中正字）的一貫作風，常常不尊重指揮系統，有時甚至直接指揮到師、旅、團等單位。」⁹⁸

⁷⁸ 「蔣中正致晏勛甫電」（1938年5月17日），〈籌筆—抗戰時期（十二）〉，《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12-042。

⁷⁹ 張秉均，《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8年10月），頁240。張秉均時係軍令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即作戰處處長，負責承辦蔣的計畫命令，此手令由其經手。

⁸⁰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71。

⁸¹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43。

⁸² 「李宗仁白崇禧呈蔣中正電」（1938年5月22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7。

⁸³ [日]防衛府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支那事變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43。

⁸⁴ 《蔣中正日記》，1938年5月18日。

⁸⁵ 例見「蔣中正致孫連仲電」（1938年5月18日），〈籌筆—抗戰時期（十二）〉，《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12-045。

⁸⁶ 例見「蔣中正致李宗仁電」（1938年5月17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43。

⁸⁷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國軍作戰經驗》，頁145-146。

⁸⁸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27-49、315。

⁸⁹ 王宇高、王宇正輯錄，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游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12月），頁107。

⁹⁰ 《蔣中正日記》，1938年5月20日。

⁹¹ 「蔣中正手令」（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2。

⁹² 《蔣中正日記》，1938年5月21日。

⁹³ 「蔣中正致第一戰區電」（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3、002-020300-00010-054。

⁹⁴ 「蔣中正致桂永清宋希濂電」（1938年5月21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5。

⁹⁵ 「蔣中正致商震電」（1938年5月22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6。

⁹⁶ 「蔣中正致商震電」（1938年5月23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8。

⁹⁷ 「蔣中正致宋希濂電」（1938年5月23日），〈革命文獻—徐州會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0-059。

⁹⁸ 宋希濂，〈蘭封戰役的回憶〉，頁159。

蔣的越級指揮，並未使戰局好轉，他沒有檢討自己指揮的問題，而是認為「指揮官不得其人」，並反認為他的督戰讓局勢不會過度惡化，謂：「若我不駐鄭，則大事去矣。」嘆息黃埔出身的將領「糊塗無用」。⁹⁹就蘭封附近的戰鬥來看，蔣的指揮似無甚問題，而就算沒有他的越級指揮，戰況似乎仍然不利。越級指揮可能造成一些負面的效果，如「作戰被動，令打則打，令追方追，無令則一味觀望」，「完全倚賴耳目太遠之高級官命令」。¹⁰⁰但至少在蘭封戰鬥時，這些缺陷並未十分明顯。

事實上，越級指揮並非蔣個人的風格，它普遍出現在國軍各級指揮體系之中。如武漢會戰時，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便曾指揮及團級，並律定師部位置。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更指定各步兵營之詳細位置。¹⁰¹又，論者批評蔣中正越級指揮，其實，軍事委員會作為一整體，本身就可能越級指揮，只是軍事委員會對外命令多以蔣的名義發布，且蔣此一風格明顯，故越級指揮產生諸問題，日後多集矢於蔣個人身上。例如，3月21日，統帥部修正臨城保衛戰之部署，規定「張軒師及獨四四旅歸孫仿魯（連仲）指揮守備運河」、「另以兩團由汝上方面向肥城、大汶口挺進游擊，限旬日到達」，¹⁰²直接規定到團一級的部署。又如，5月27日，統帥部下令編組掃蕩隊，其編組細節，不交第一戰區擬訂，而由統帥部直接律定——第一掃蕩隊規定以第十三軍騎兵團及第二師騎兵團、機械化第一搜索支隊、戰車防禦砲一連、工兵一連編成；第二掃蕩隊以騎兵第十四旅、機械化第二搜索支隊、戰車防禦砲一連、工兵一連編成。這樣及於連的編組，似過於詳盡。上述兩電，署名皆為「蔣○○」，可判斷是軍令部代蔣所擬之命令（詳第四節）。¹⁰³而兩電皆有附知其上級長官，如前者同時分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各相關總司令、軍團長、軍長，後者同時分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及相關軍團長、師長、旅長。因此，第四師師長石覺日後反省武漢會戰之失，謂：「統帥部命令太過詳盡，代替各級指揮官職權，因此狀況一有變化，常難適應戰機。」¹⁰⁴其所說的便是「統帥部」而非蔣中正個人。

進一步言之，軍事體系固然分層，但在縱向指揮系統軸上，較高層級對其下各級有相當權力，這是相當自然的。其實，越級指揮有時目的為擺脫指揮系統之疊床架屋，使其更有效率。若越級指揮有副知縱向系統上各級，或更能爭取時效。國軍一直有縮編之議，以大敵當前而暫緩。武漢會戰後，國軍在湖南南嶽召開大型軍事會議，便議決減少指揮級數，以避免報告轉達遲滯，使戰術、戰略之指揮，更為靈活。¹⁰⁵再者，國軍愈高層，所獲情報更為全面，依此而來的部署，思考可能更為周延。

⁹⁹ 《蔣中正日記》，1938年5月22-24日。

¹⁰⁰ 《徐永昌日記》，1938年6月7日。

¹⁰¹ 蘇聖雄，〈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決策〉，收入《國防大學慶祝建國100年「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2011年12月），頁138-139。

¹⁰²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頁595。

¹⁰³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頁618。

¹⁰⁴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125。

¹⁰⁵ 蘇聖雄，〈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決策〉，頁139。

蔣中正透過侍從室的命令，有時相當瑣細，而此命令，未經過軍令部較龐大的參謀團的研討，或難以避免顧慮較不周全。又，蔣親自發出的命令，權威高於軍令部以蔣名義發出的命令，前線部隊較不敢違背（詳第四節），因而產生推卸責任的狀況。徐永昌便謂：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卸〕，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¹⁰⁶

徐永昌對此情有所不滿，甚至認為軍令部發出的電令所以亦甚瑣細，是蔣中正要求所致。其實，在國軍越級指揮、瑣細指示的指揮文化之下，軍令部不用蔣的要求，本身便可能指揮過細，像是第四節所引1940年5月10日的官邸會報，軍令部後來發往前線的命令，增補了蔣在會報中的指示，內容更為詳盡。

要之，吾人對蔣中正的越級指揮，可能可以再細緻區分是蔣中正透過侍從室的越級指揮，抑或通過軍令部的運作發出的越級指揮命令。前者可以明確看出蔣的指揮作為，後者則很大程度上是高層參謀作業的展現。

六、結語

中日戰爭時的中華民國統帥部，為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中，參謀總長何應欽本應襄助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工作，但在指揮作戰方面，何應欽參而少謀，反倒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軍事委員會主管軍事作戰的核心機構，是為軍令部，該部成員為蔣中正重要軍事幕僚，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軍令部次長熊斌、林蔚，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等，在戰事中，他們為蔣擬訂作戰計畫，轉達命令，負與前方聯繫之責，甚至組織臨時參謀團，赴前線代蔣督導戰事進行。外國軍事總顧問，亦得參與機宜，為軍事委員會重要成員之一。

戰爭中軍事委員會的軍事決策，主要在委員長官邸會報中進行，蔣在其中作出部署決定，軍令部再依蔣的意思，製成命令，發布前線，這是依常規軍事系統下達的命令。而蔣欲發揮個人影響力或戰況危急的時候，會另外透過侍從室，逕令前線。

檢討軍事委員會在徐州會戰中的指揮，以情報來說，軍事委員會情報來源多元，許多相當精確，如正確偵悉日軍發動總攻的日期，惟來自前線部隊的情報，十分不確，甚至上下欺瞞，捏造事實，因而影響軍事委員會的判斷。情報傳遞過遲，亦是一大問題，致使軍事委員會命令無法及時傳送，前線情報也難立刻上達。以判斷來說，統帥部最大的問題，是過於關注魯南戰況，忽視魯西防禦，將大量預備隊自此調離，因而在日軍由後包抄時，難以及時回應。以通訊來說，統帥部與前線的通訊，大抵暢通，惟戰區以降至基層部隊，或部隊與部隊間的通訊，卻有很大的問題。以越級指揮來說，此舉在會戰初期並不明顯，至蘭封戰鬥戰況

¹⁰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44年6月12日，頁332。

危急時，蔣中正方不斷越級指揮其嫡系部隊。越級指揮的狀況，對徐州會戰的進展，並無明顯影響。論者常批評蔣的越級指揮，其實這樣的狀況，普遍存在於國軍各級，且越級指揮不見得是個負面的指揮方式，此舉一來得擺脫疊床架屋的指揮機構，一來可將視野更廣的統帥部思維注入實際戰場之中。又，蔣中正透過侍從室的越級指揮，與其通過軍令部的越級指揮，兩者可做區別；前者體現蔣的指揮作為，後者很大程度上是高層參謀作業的展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ober Lyman 等著；

一桃園市八德區：國防大學，民 104.10

面 公分

ISBN : 978-986-04-6217-3

GPN : 1010401968

1. 紀念抗戰勝利 2. 文集

書名：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著作權人：國防大學

主 編：鄭德美

副 主 編：蔡承棟、劉育全、戴家有

作 者：Rober Lyman、Takita Kenji、Chieh Chun、胡敏遠、張勝凱、
馬煥棟、王長河、朱浤源、姚敏芝、蕭明禮、蘇聖雄、陳立文

執行編輯：廖瑞芳

封面設計：王信為

展 售 處：五南文化廣場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地址：400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 / (04)22260330

國家書店 網址：www.govbooks.com.tw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 / (02)25180207

出 版 者：國防大學 網址：www.ndu.edu.tw

地址：334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1000 號

電話 / (03)3654723

印 製 者：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401 廠北部印製所

其它類型版本：無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初版

定 價：300 元

印製數量：300 冊

ISBN : 978-986-04-6217-3

GPN : 1010401968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或書面授權。